

论鸦片战争以来晚清社会的变化

蔡国斌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鸦片战争后晚清社会动荡不宁,西方殖民势力楔入中国,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展开了一系列自我变革。透过这些社会变化的表征,可以发现内外的交互冲击之下,晚清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点。

关键词 晚清社会 变化

中图分类号 J K25

文献标识码 J A

文章编号 J1671 - 2803(2006)01 - 0077 - 04

鸦片战争是有清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自此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受到外力的强制牵引而改变,大清帝国开始被纳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晚清社会也从此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

打开晚清社会的画卷,最为醒目的特点有三:其一是社会的动荡不宁。自鸦片战争以降的晚清70余年历史,时间虽然短暂,却显得纷繁复杂,战乱不断。晚清政府既要应对外侮又要平息内乱,70余年几无宁日。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又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英法于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于1884年挑起中法战争,日本于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又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这些战争均以清政府丧师失地,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与此同时,随着各种矛盾的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层出不穷。1851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后捻军在中原继续坚持战斗,西北则有陕甘回民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族、彝族人民起义,这些起义军直到1872年才最终被镇压;不过二十余年,1900年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1911年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爆发,直接宣告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灭亡。

连年的战火导致了晚清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凋弊,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往往是疮痍未复而新创又至。战火燎原之地,人民流离失所,人

口急剧下降,耕地急剧减少。“在中国内地,那些曾被富裕的城市和良田所覆盖的大片土地现在荒芜了”^[1]。战争在消耗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对社会生产又直接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贫困线上。

其二是西方势力的楔入。晚清时期的中国大地上,西洋人的身影日益增多,来自西洋的商品、文化也影响日增。诚如冯天瑜先生所指出的:“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开端,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的姿态首先从军事上,既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2]晚清时期,西方势力通过肮脏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因此而随处可见西方势力的身影。西洋文化飘洋过海来到中国,透过开放口岸的外国租界,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势力的楔入对晚清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它带来的全新文明形式,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给晚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迫使晚清政府做出回应。西方学者就是以这种“冲击——回应”的模式来阐释晚清历史的。

其三是晚清社会接二连三的自我变革。为应对西方的挑战,一批爱国仁人志士首先开始主动

[收稿日期] 2005 - 10 - 25

[作者简介] 蔡国斌,武汉大学历史系 2004级博士生。

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进而扩展到思想文化以及政治领域。为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随着西风东渐,清政府也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于对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感性认识,以魏源、严复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向西方学习。在 19 世纪 60 - 70 年代,在地方督抚的推动下,兴起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90 年代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将改革引向深入,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20 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又在全国推行新政,并学习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不成功的“君主立宪”尝试。这些变革,有的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有的是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的,而且各种改革措施在全国各地的执行情况各异,因而使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加扩大。变革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透过社会变化的表征,可以探查到晚清社会所发生的深层次的变化。首先是社会性质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此后,随着列强侵略程度的加深,晚清社会一步一步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力。《南京条约》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肆意践踏中国的主权。五口通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割让香港,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协定关税,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受到侵犯;领事裁判权的规定,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继《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列强又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条约体系。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就如同一个个套在清政府头上的紧箍咒,就意味着更多主权的丧失。继割让香港之后,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被沙俄巧取豪夺;外国领事和外国军队常驻北京,将清政府置于列强的严密监督之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强行划定租界,设置“国中之国”,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阵地;外籍税务司制度,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落入外国人手中;关税税则的修订和有关子口税的规定使外商获得了远较中国商人优惠的条件;西方列强还竞相争揽对华政治贷款,控制中国财政;在华开矿、办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资源,如此等等。在条约体系

的束缚之下,清政府政治上的独立性丧失殆尽,中国社会经济独立发展之路被阻断。中国社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外国势力这一新的起到左右作用的力量。到清末,中国已经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原材料、倾销商品的殖民地,“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31] 社会性质的变化是晚清社会最根本的变化,它规定着晚清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

其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但基本的社会结构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官僚、地主、士绅、农民、商人、小手工业者这些基本的社会单元具有惊人的稳定性,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代代相沿。晚清时期,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冲击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撒下了另类的种子,中国社会内部则爆发了急风暴雨般的农民战争,它有如犁耕一般翻垦着中国传统社会这块土壤。内外的交互冲击促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结构成长起来,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在原有社会构成中,变化最巨者为商人这一社会阶层。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视商业为末业,从商者向为世人所鄙。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楔入中国社会之后,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展,商务活动日渐频繁,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之而不断提升。清政府为奖励工商,还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工商业者凭籍一定规模的资财即可获得爵禄。这一政策取向表现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剧变。而“观念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现实的变化,还影响现实的变化”^{[41] (P245)}。清末工商业之所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正得益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除原有社会阶层之外,晚清社会还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口岸开放和西方在华商务活动的拓展,买办阶层首先在口岸城市应运而生。他们依附于西洋势力,又天然地具有民族性。近代买办的出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近代中国社会的土壤使得买办阶层得以发展壮大并最终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41] (P6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原材料、设厂开矿的过程中,也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到了中国沿海开放口岸。而资本主义关系在城市社会发生和发展

之后,必然会推及、影响到农村,并促成农村社会的演变。^{[4](136)}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在传统的封建官僚与士绅之中分化出一批新型工商业者,他们与买办一起,构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城市贫民和农民之中也分化出一批从事近代工业生产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这两股新的社会力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他们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必然要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冲击,要求建立近代社会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清社会孕育了灭亡自身的力量。

其三是经济结构的剧变。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象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4](P218)}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以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为主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大量涌入,首先就遭遇到中国传统经济的顽强抵抗。第一个回合下来,中胜西败。西方商品积压严重,西方商人“发了疯似的”抢占中国新市场的迷梦破灭。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借助于炮舰的力量,发起了又一轮更为猛烈的冲击。廉价的洋纱、洋布、洋油、洋火战胜了中国的土产品,中国传统经济终于抵挡不住西方商品的进攻,败下阵来。西方国家在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又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攫取了内河航行权、在华开矿权、铁路修建权、口岸设厂权等特权。在工业领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机械,首先从制造部门引入中国。在中国出现了以机器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清政府以及民间商人开办了诸如兵工厂、造船厂、缫丝厂、棉纺厂等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除此之外,进出口贸易及国内商贸流通的发展,促使旧式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化,使商贸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原来农业一统天下的经济构成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工业和商贸业在经济结构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是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文化。相对于经济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更为艰难漫长的过程。晚清社会儒家体系固然依旧在思想文化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却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西方国家试图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传教士与商人一起东来,

但由于传教士比商人更具献身精神,因此,西洋宗教在中国登陆之后,比商品走得更远,甚至深入穷乡僻壤。^{[4](P140)}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兴起了救亡图存的思潮,一大批爱国仁人志士主动向西方学习,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西学”在中国广为传播,继之,西方民主思想、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接受。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厌洋排外变为崇洋,从贱商到崇商。在思想领域,晚清时期先后出现了洋务派与守旧派、维新派与洋务派、革命派与维新派的三次大论战。每一次论战都给传统思想以巨大冲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在教育领域,新式学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出国留学人员日渐增多。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更是教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突破了孔孟之道的思想藩篱,在他们的带动下,“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等文化变革先后兴起,为晚清社会变迁带来新的生机。

在社会生活方面,“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4](P63)}据上海《法华乡志》记载,“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矣。”^{[5](P336)}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口岸开放城市。在这些城市,社会风气较为开化,人们在衣着方面追求时尚,“光绪年又渐尚短衣窄袖,至季年,马褂不过尺四、五寸半,臂不过二、三寸,且仿洋装,制如其体。”^{[5](P331)}在食、住、行、礼仪、习俗等方面均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变化。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广大农民中,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依然得到保持,晚清社会中新旧风俗杂陈的现象大量存在。

晚清社会的变化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晚清社会处于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阶段,这一阶段新旧事物处于激烈交战之中,因之除旧布新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晚清社会正是在除旧布新的历史过程中艰难地实现其蜕变。当然新旧事物的斗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新生事物的诞生与旧事物的破除往往并不同步。有时布新而不除旧,有时旧已除而新未布。

但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是总体趋势。第一次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肇始,但并不意味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立即形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虽然中国国门被列强打开,开放了五口,但外国势力的影响仍然局限于沿海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在广袤的中国内陆,则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结构与风貌,整个社会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延伸,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19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兴起了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既标示出西方国家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又反映出中国社会内部开始主动求变,出现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元素。1894年甲午战后,晚清社会的变化进程大大加快。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年《马关条约》和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自主权全面丧失,半殖民地社会正式形成。另一方面,在日益彰显的社会危机的逼迫下,在西风东渐的推动下,晚清社会逾越了“变器不变道”的藩篱,社会变革从技

术、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从社会的表层结构推进到深层结构,近代社会的因子与特征日益增多。晚清社会的变迁改良与革命交织,进步与倒退共存。总之,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急剧,从表层到里层的变化过程。

参考文献:

- [1] 芮玛丽. 同治中兴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87.
- [2] 冯天瑜等著. 中华开放史 [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48.
- [3]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 383.
- [4]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5] 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 [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方 圆

(上接第 76页)《罗刹海市》写马骥来到罗刹国都“时值退朝,朝中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国也’。视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又数骑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职,率狰狞怪异;然位渐卑,丑亦渐杀’。寥寥数语,生动凝炼,把这群丑陋不堪、凶狠残暴的昏官形象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作者并未直接阐明自己的态度,但对这群人物又丑又怪的肖像特征毫不留情地艺术夸张,却清晰地显露出他的强烈厌恶和憎恨。作者又善于通过讽刺对象之口,让他们直接暴露心灵深处的卑鄙龌龊。如《鸽异》写张幼量将“人世亦绝少”的两只白鸽送给某贵官,自信胜过千金之赠。“他日见某公,颇有德色;而其殊无一申谢语。心不能忍,问:‘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张惊曰:‘烹之乎?’曰:‘然。张大惊曰:‘此非常鸽,乃俗所言鞑靼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无异处。张叹恨而返’。表面上看,作品对此贵官未作任何评价,但通过这三句高度典型化的语言,却清楚地显示了他既贪又馋,且愚蠢、麻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作者的褒贬也即寓于这几句对话之中。记得高尔基曾经称赞契诃夫只用一个词就足以创造形象,这个精论移作《聊斋志异》此类作品的评语,也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聊斋志异》的讽刺手法并不总是旨微而语婉,有时也表现为笔无藏锋,尖锐辛辣。《仙人岛》写“屡冠文场的王勉来到仙人岛,桓氏同女儿芳云、绿云轩洒款待,席间,“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乃炫其冠军之作,题为孝哉闵子骞二句,破云‘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顾父曰:‘圣人无字门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闻之,意兴索然,桓笑曰:‘童子……何诵至佳处,兼述文宗评语,有云:‘字字痛切。绿云告父曰:‘姊云:“宜删‘切’字”众都不解。桓恐其语,不敢研诘。王诵毕,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芳云又研口语妹,两人皆笑不可仰。绿云又告曰:“姊云:‘羯鼓当是四挝。众又不解,绿云启口欲言,芳云忍笑诃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众大疑,互有猜论。芳云、绿云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云:“不通又不通也。众大笑。芳云、绿云都是天真活泼、心直口快的少女,作品为她们安排的语言明快而不直露,辛辣而不生硬,既切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又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惊人才华。

责任编辑:理 言